

楊志政文集

陋室存稿 下

楊志政文集

陋室存稿 下

中  
华  
书  
局



八十华诞留影



与周一良（右）、朱雷（中）合影



与台湾中研院院士萧启庆（左一）留影



2001年在南开园与台湾大学王德毅（右二）合影



1998年在南开园与日本学者松田孝一（左一）合影



八十华诞与京津同仁、学生合影



与研究生们合影

# 关于元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历史教学》编者按：这是杨志玖教授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作的一次学术报告，对元史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都很有帮助。现由本刊编辑记录整理，经杨先生审订后发表。

元朝从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灭亡南宋统一中国到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为止，不过九十年；有的书上从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建国号为元算起，也不过九十八年。在历代统一王朝中，除西晋和隋朝外，他享年较短，兼之是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因而在历史教学中不受重视。其实，元朝的历史还是有他的特点，在历史上还是有一定地位的。

## 一 元史的特点

（一）世界性 蒙古和元朝的创业者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不仅统一了中国，而且征服了中国以外的世界。他们曾征服中亚和西亚，进军东欧，建立了钦察汗（中亚咸海、里海及黑海以北），伊儿（里）汗（中亚阿姆河以西、地中海以东、阿拉伯海以北、钦察汗以南），察合台汗（阿姆河以东、天山南北一带）等汗国，征服东亚、南亚诸国。铁蹄所向，震撼了当时的世界。连远在意大利的罗马教廷也派遣使节和蒙古联系。其时伊朗的志费尼写了一本书叫《世界征服者史》（今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中译本），就是记载成吉思汗到其孙蒙哥汗的历史。“世界征服者”这一头

衔加到成吉思汗的头上并不过分。蒙古的兴起确实是世界历史上的一大事件。

由于和世界有关,所以关于蒙古和元朝的历史,除了汉文记载以外,还有其他国家的文字。《世界征服者史》是用波斯文写的,另一部重要的波斯文著作叫《史集》(有商务印书馆译本),记载了从成吉思汗到他四代孙元成宗时期的历史,这两部书都是研究蒙古和元朝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此外还有阿拉伯文的、阿美尼亚文的以及欧洲各种文字(拉丁、意大利、法、俄等文)的重要史料。这是世界性的表现之一。

由于和世界有关,因而世界各主要国家都有学者研究蒙古史和元史。如苏联、德、法、英、美、匈牙利、日本等国,都很注意这门学问,研究的成果也很可观。这是世界性的表现之二。

因此,我们研究元史,就不能光注意中国的情况,也要兼顾与元朝有关的其他国家的情况;不能单从中文找资料,也要从外文找资料;不能单参考本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要探寻外国学者的学术信息。研究元史,真得“面向世界”啊!

顺便提一下,我说元史时,常一并提到蒙古史,因这二者有密切联系。元史是蒙古民族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研究蒙古史必须了解和研究元朝这一段;研究元史,当然也要研究和了解这一段的蒙古民族史。但二者也有区别:蒙古史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研究自有蒙古族以来到今天的历史,是通史;而元史只是蒙古民族史的一段,是断代史。同时,研究元史不仅要研究蒙古族的历史,还应研究国内其他民族——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历史。

(二)多民族性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国家,而元朝尤其突出。蒙古民族是统治民族,当然是研究中心;此外,还有大量的西域人来到中国,散居各处。这些人种类繁多,名目不一,因而也称色目人。色目就是诸色名目之义。色目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占有重要地位,在《元史》和其他元代史料上留下了不少纪录,也需要研究。研究元史时,总要碰到一些非汉人的人名、制度和事物名称,不能略而不顾。研究汉族王朝的历史,以汉族的人物和文物制度为研究对象就可以了,研究元

史就不能这样简单。这就是元史的多民族性的表现。

(三)研究上的困难性 由于以上这两个特点，就带来了第三个特点，即研究上的困难性。研究其他朝代的历史，翻阅汉文史籍就够了(严格说来当然还不够)，研究元史，就不能单打一地死啃汉文资料；即令是汉文资料中，也有许多国内其他族的以及外国的名词术语、文物制度，不了解(即令是粗浅的了解)这些东西就无法进行深入的研究。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新元史》卷一《序纪》说：“蒙古之先，出于突厥，本为忙豁伦译音之变为蒙兀儿，又为蒙古。”这几句话，问题很多：

首先，蒙古是否出于突厥，就大成问题。现代的研究已经证明，蒙古和突厥是两个不同的族系，虽然蒙古受突厥的影响很大。

其次，说蒙古本称忙豁伦也是错误的。忙豁伦即 mongol-un 的译音，其义为蒙古的，伦是语尾 l 加所有格 un 的合音。

最后，蒙兀儿这个名称也不能成立。蒙兀是唐代的译音，当时兀字已有尾音 L 在内，再加儿字，即叠床架屋。(见韩儒林《蒙古的名称》，载《穹庐集》中)

这说明研究元史，应对蒙古语有点起码的知识。至于藏语、维吾尔语，也应该有所了解。由于有外文资料和外国学者的研究，对于外语也应该学一些，最低应懂得一两种外语才好。

总之，研究元史，要过语言文字这一关。这要比研究其他中国朝代史甚至比研究某一外国史还要艰巨。险关在前，看你敢闯不敢闯；高峰连天，看你敢攀不敢攀。为了祖国学术文化事业，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应该不畏艰险，知难而进，使我们在这一世界性的学问上能占据一席之地。同时，不要急于求成，要按部就班，循序渐进；还要分工合作，就自己的所长和所近进行研究，不必把一切问题都揽到自己头上来，有些自己不懂的问题可以请教旁人。这样坚持下去，定会有所成就。克服了困难后，才会感到胜利的喜悦。

以上的特点，是就元史研究方面，也就是从“元史学”的角度来谈的。下面来谈一下元史上的一些具体问题。

## 二、元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元朝的统治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

如上所说,由于元朝统治全国比较短暂,又是少数民族统治,因而不被重视,认为是残暴统治,黑暗时代。过去还有一种偏见,认为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社会就要倒退,中国就是亡国。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哪能因为他们坐天下就算亡国呢?这种传统的偏见到今天虽然基本上克服了,但对元朝的统治一般仍然印象不佳。应该怎样看待元朝的统治呢?

(一)从社会经济方面看 我认为,不能一言以蔽之,而应该根据时间和空间的不同,分阶段、分地区地进行观察。大体上,可以元世祖忽必烈的统治作为时间划分的标志。

在元世祖以前,也即是大蒙古国时期,由于蒙古是游牧民族,其社会发展阶段、文化水平和生活习俗都与中原地区不同,又在进行征服战争中,因此他的骑兵所到之处,对城市的破坏、对人民的杀戮掳掠确实很严重,造成了社会经济的残破局面。在元太宗时期,甚至有蒙古人认为汉人无补于国,建议“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元史·耶律楚材传》)。这听起来很荒唐,但从游牧经济的角度来看倒是可以理解的。这一建议由于耶律楚材的劝阻没有实行,真行起来也会遭到汉族人民的拼死抵抗。可以想见,当时的蒙古统治者还不会治理汉地,这对蒙古,特别是对广大汉族人民都是有害的。

但是,蒙古统治者要想在汉地站稳脚跟,非适应汉人社会情况不可,事实上,耶律楚材的任用已逐渐改变了一些蒙古办法。这是时代的要求,元世祖即位以后,更加自觉地适应这一要求。

元世祖即位前,已主动接近汉人学者,向他们征询治国之道。他即位后,任用汉人,采行汉法。他说,“使百姓安业力农”,这事蒙古人不

懂,非汉人不行。他重视农业,鼓励生产,设立司农司,专掌农田水利事业;又由司农司编了一部《农桑辑要》,颁布天下,传播农业技术知识。这部书在元代印行过几次,最多的一次印了一万部,可见它流传之广泛。此外,还有元仁宗时王祯写的《农书》,元文宗时畏兀儿人鲁明善写的《农桑衣食撮要》,这三部农书的编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世祖以后农业的发展。

在手工业方面,棉花的种植已推广到长江流域,关中地区也有种植。苧麻已在河南栽种。而黄道婆把海南岛黎族的纺织工具和技术传到上海松江一带,提高和改进当地棉布的产量和织布技术,更是值得一提的经济事件。

在商业方面,从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对于当时中国商业的记述可见到商业的繁盛。他有一章专记“汗八里(今北京)城之贸易发达户口繁盛”,说这里“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中册,379页)。京兆城(今西安)“工商繁盛,产丝多”(同上,431页)。类似的词句,差不多他所到之处都用来叙说。而刺桐(今泉州)则“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亚历山大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港者则有船舶百余”(同上,609、611页)。马可波罗称赞元世祖是“人类元祖阿聃以来迄于今日世上从来未见广有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同上,286页),虽有夸张之嫌,但若无当时经济发达的背景,他也不会有这些话的。

再就地区来看,华北、长江以北地区由于战争频繁持久、经济破坏较严重,恢复较慢,而在江南南宋统治地区,由于战乱较少,又有过去发达的基础,经济一直是发展的。从马可波罗关于行在(杭州)的繁华富庶情况的描绘也可见一斑,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之,就元朝的统治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来说,不应只看到初期的破坏方面,也应该看到元世祖即位后的恢复发展方面;不应只看到北方初期的破坏方面,也应该看到南方经济的发展方面。

(二)从政治方面看 元朝的统治确有许多落后的表现,如把人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四等人在政治和法律上待遇不平等。这

种民族歧视和分化政策是元世祖时期制定的,说明这位开明君主也不能摆脱统治阶级的民族偏见。而这一政策加剧民族矛盾,也是引起元末农民起义的因素之一(当然不应忽视阶级矛盾)。但是,元朝的统治也不是毫无可取之处。如:

(1)开放政策 元代中外交通发达,无论从陆上或海上,都有许多外国人来华,元朝政府允许和欢迎他们来。如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和他父亲、叔父从陆路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十七年,备受优待,最后从海路返回故乡。对外来人和外来事物,元政府都不排斥。如天文历法,除了采用汉人郭守敬的《授时历》外,还采用回回人札马鲁丁的《万年历》。

(2)宗教宽容政策 元朝容许各种宗教的传播,优待教士,免除寺院的一些赋役负担。当时除中国固有的佛教和道教外,还有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西藏的喇嘛教。他们都建有寺院,拥有不少信徒。可以说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吧。

(3)思想放任政策 由于蒙古统治者文化低,思想单纯质朴,没有条条框框,因此对汉人士大夫的思想和言论不加干涉,没有采取思想统治或控制政策。元人杂剧中有许多愤世嫉俗或抨击时政的言词,过去多认为是元朝政治黑暗腐朽的反映,这当然有道理。但从另一角度看,这些词曲得以流传并保留下来。不正说明元政府对这些作品未加干涉吗?

顺便提一下元代儒士地位问题。当时有人说,儒士地位很低,所谓“九儒十丐”,即儒士地位高于乞丐而在其他人等之下。这是南宋遗民谢枋得和郑思肖出于亡国的激愤之情而发的牢骚,并不是实情。谢枋得在开头就说:“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可见他本人也知道这是“滑稽之雄”对儒士开玩笑的话(《谢叠山集·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事实上,元代儒士可享受免除赋役待遇;在元世祖以前,儒士被俘为奴隶者即被释放,更不用说还有些儒士进入仕途的了。

(4)轻刑政策 一般想象,元朝以武力得天下,刑罚一定残酷,其实不然。《元史·刑法志》说,元初“循用金律,颇伤严刻”,元世祖统一后则“简除繁苛,始定新律”,也就是有所减轻。又说:“元因之(指五刑——引者)更用轻典,盖亦仁矣。”“自后继体之君,惟刑之恤。”《刑法

志》总结说：“然则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缓弛而不知检也。”这些可能有明初史臣（多元末遗民）溢美之辞，但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如五刑中的笞和杖刑，过去都是从十下开始，现在则减三下作七下。据说这是元世祖定的，为的是“天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叶子奇《草木子》）。叶子奇又说，当时的犯人虽然定了死罪，也不加刑，最后老死在监狱中。因而七八十年之中，看不见杀人的事，偶尔见到一个死人头，大家就很惊恐。这可以和《元史·刑法志》印证。

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或者从客观效果看，元朝的统治在历史上还是有他的积极面的。主要是：

**（一）国家的大统一** 从唐末五代到元代的统一，将近四百年，中国陷于分裂的局面。即令在唐代盛时，吐蕃、南诏、回纥只是和唐政府有名义上的隶属关系，实际上还是独立的。到元朝，边疆和内地才真正形成为一体。云南和塞北成为元朝的两个行省（云南、岭北），吐蕃归设在大都（北京）的宣政院直接管理，今新疆维吾尔族居住区设宣慰使管辖，东北全境由辽阳行省统一管理。真所谓四海为家，无此疆彼界之分了。

这是我国历史上从唐朝以后一次规模空前的统一，对于我国疆域的奠定，边疆的开发都有重大的作用。

**（二）民族的大融合** 在全国大统一的局面下，我国民族关系有了新的发展，民族的融合更加强了。蒙古族以前住在大漠南北，现在则通过从政、驻防、屯田等关系大量移居内地，有的跑到云南，在那里安家落户。西夏人、维吾儿人也有很多人散居内地。在北方的契丹人、女真人，由于和汉人接触较早，在风俗习惯以及文化上大部与汉人融合，此时便被称为汉人。同时，契丹这一名称又被蒙古、中亚和欧洲人作为中国北部和北部汉人的统称，至今俄文仍称中国为契丹。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突厥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大批到中国来，被称为回回人，他们逐渐说汉语，用汉文，因而形成了一个新民族——回族。这些民族由于长期和汉人接触，逐渐接受了汉族的传统文化，出现一些文学家、艺术家和思想家，还有一些政绩卓著的政治家和科技人才。他们对当时的社会作出了贡献，也为后世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历史遗产。

(三)中外交通的发达 由于蒙古势力的扩展,元代中外交通很发达。汉唐以来的丝绸之路,比以前更畅通了,而且更为安全。因为在陆路上设有驿站(元代叫站赤),由专人管理食宿,供给交通工具(主要是马匹)。由大都或上都(内蒙古正蓝旗闪电河北岸)西去可到达地中海或黑海沿岸城市。海上交通从泉州出发,可到达东南亚、印度、波斯湾和东非洲等地。各国的商人、使节、传教士和我国的使节、商人等时常往来于这两条道上,尤以西方人来的最多。如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一家就是由陆路到达上都,在中国住十七年后,从泉州由海路到达波斯后再返回故乡的。而马可波罗写的《游记》,盛赞中国和东方的富庶,引起西方人对东方的向往,哥伦布的发现新大陆,就和他读了马可波罗《游记》后想到东方来有关。历史进程像波浪一样一浪推一浪,而这一浪源竟和元朝的建立有关!

中外交通的发达带来了中外尤其是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国的印刷术这时先传到伊朗,以后又传到非洲和欧洲,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纸牌也是这一时期传到欧洲的。蒙古西征时,把火器传到阿拉伯,他们称之为“契丹火枪”和“契丹火箭”,从那里传到欧洲,对攻破封建贵族堡垒,摧毁封建制度起了一定作用。有趣的是,阿拉伯人的抛石机(回回炮)在元世祖时传到中国,攻破了南宋的襄阳和樊城,对元朝的统一中国发挥了作用。阿拉伯人的天文仪器和历法(回回历、万年历)、医药(回回药方)也传到中国,而中国的天文学家也随同旭烈兀(成吉思汗孙,伊朗的征服者)到达伊朗,对伊朗天文学者传授中国的天文历数之学(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下册,1962年,91页)。这真是文化交流啊。

应当指出,这些积极面的产生,是以当时中国人民(包括蒙古人民)和西方人民的重大牺牲为代价的,不应美化蒙古的统治,当然也不应抹煞客观存在的事实。历史是错综复杂、迂回曲折的,我们应当尊重历史的辩证法。

### 三 元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

历史是社会科学，它虽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为“四化”带来直接的物质效益，但它也不是与现实毫无联系。

首先，正确认识元朝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认识蒙古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在当时所起的作用，这对于纠正传统的民族偏见，加强民族团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是有益的。

其次，“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毛泽东选集》一卷本，499页）。元代的一些制度和事物，有的在今天还有遗迹，还有些历史联系，认识它，可以探本求源，增加历史知识。举几个例子：

1.从制度上看 今天我国地方最高行政区域称为省，这是从元朝的行省制而来。元朝中央最高机构称为“中书省”。地方上则称为“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明朝虽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但习惯上仍称行省。清朝还是称行省。行省即代表中央执行中书省的政令，有加强中央集权、密切中央和地方联系的意义。今天我们已去“行”字单称“省”了，但应了解它的起源。

2.从民族关系看 蒙古族虽然在元朝兴起以前早已存在（唐朝有蒙兀，为室韦族的一部），但若不是有这一段兴盛史，则这一名称在今天是否存在或是否为人们所重视就很难说。而今天，他不仅在蒙古地区，还在云南和河南省聚居。甚至阿富汗也有蒙古族。

如前所述，回族也是在元朝开始形成的。元朝以前，虽然也有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大食）人和波斯人来到中国，但不称为回回人。只有到元朝，才把大批信教的中亚突厥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迁入中国，通过他们之间以及同汉人之间的通婚，才出现回族。可以说没有元朝，就没有今天的回族。

辛亥革命后，曾流行过“五族共和”的说法。五族即汉、满、蒙、回、藏。其中的蒙、回、藏都是由于元朝的兴起才发展壮大、同汉族形成了密不可分的联系的。藏族虽然早就存在，但在元朝才和中原地区发生了紧密的联系，而西藏地区的政教合一制度，也是在元朝建立起来的。

3.从语言上看 今天车站“站”字，来源于蒙古语，元以前不叫站而叫驿或驿传，站只作“久立”解。站有驿义从元开始。突厥语称驿为 *yam*，蒙古语借用突厥语此字则读作 *Jam*，*Jam* 再写为汉字则为站，最初还写作蘸，《元朝秘史》写作“札木”，可见它是个译音字，虽然它最早是从汉字“驿”翻过去的。又如“胡同”也多半是从蒙古语来的。胡同原作衚衕，到元曲中才出现这两个字。明末字书《正字通》说：“今京师巷道名衚衕。”元代蒙古语“井”作“忽都”（见《元朝秘史》），与胡同音近。大约巷道都有一井，因而把巷道称为胡同吧。北方有些地方把“好”称为“赛”，这是从蒙语“赛音”（好）借来的。但有一个“歹”字，有些人认为是蒙古语，义为“不好”，我认为有问题。最早主张此说的人根据的是南宋人彭大雅所著《黑鞑事略》，其中说：“（鞑人）言及饥寒艰苦者谓之鵠，鵠者不好之谓。”鵠音歹，因而把歹字说成蒙古字。其实，元时蒙语不好叫“卯危”，汉译作歹（见《元朝秘史》67 节），可见歹是汉字，而《黑鞑事略》在另一处就说：“不予则曰冒，鞑语不好也。”冒即卯危另一译写法，今天蒙语仍写作 *magu*，读作 *mau* 正与冒音相近。因为到现在还有这个说法，所以多说点。

还有俄罗斯这个译名也是元朝才有的。俄罗斯本应称罗斯（Ross、Russ 或 Rossia、Russia），因蒙古语不能发以 R 为首的卷舌音，只能把 R 后的元音移到 R 前面重读，因而 Ross 便成 oross 或 uruss，在元代写作斡罗思或兀鲁思、斡鲁思，清朝又把斡改成俄字。

4.从对外关系看 元史既是世界性学问，世界各国学者研究的很多，我们研究它，既可以和世界同行切磋学术，在国际元史学界占得应有地位，同时也增进了与世界学者的友好关系。这是就学术而言。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是否也有作用呢？比方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元朝住了十七年，他的《游记》对中国充满了赞美友好之情，是中国和意大利人民友好

关系的历史见证。但前几年有人说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说他的《游记》是他在中亚从到过中国的商人听来的，或从波斯文的导游手册抄来的。如果此说可信，不仅马可的书要大为减色，中、意的历史友谊也会受到损害。这就不是一件小事了。幸好我们从中国史籍里找到与马可波罗有关的第一手资料，证明他确实到过中国，足以驳斥否定马可波罗到中国的说法。这样看来，研究元史还是有它的现实意义，而不是可有可无的了。

(原载《历史教学》1985年第4期)